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李宗桂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李宗桂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玉玲

封面设计：迪 赛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李宗桂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新世纪电子媒介有限公司排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厂址：湛江市霞山菉塘路61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4·125 印张 1 插页 300,000 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218—02298—7/G·497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

总 序

于幼军

冬寒夏暑，春华秋实。社会科学园地的耕耘者，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汗水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的出版，就是金灿灿的果实。

我们的时代需要理论。理论对社会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被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人文主义思想和精神，就不会有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的创立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批国家的胜利；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很难想象，没有理论，社会的巨轮能够在历史的航程中自由行驶。今天，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当中，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要求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战略和策略，以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要求我们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可以使我国后来居上的发展道路；要求我们探索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回答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着壮丽的事业。社会科学大有作为。

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耕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幸的是，我们有一支乐于在这块园地默默耕耘的队伍。正是他们的勤奋与才华，使得我省的这块园地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广东省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将展示我省这支队伍中的中青年学者的探索历程和学术成果。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决定组织出版这套文库，更主要的是借此推动广东的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队伍建设，促进广东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长江后浪推前浪，要使社会科学事业如同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唯有源头活水不断。我们要看到，广东社会科学理

论研究队伍在人才辈出的同时，也存在人才流失、一些单位和学科后继乏人的现象。因此，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思想活跃、理论素质好、科研能力强的跨世纪中青年社会科学人才，刻不容缓。我们要努力创造让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尽快成长的条件；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形成活跃的学术氛围；要深化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机制。我相信，文库的出版，必将激励我省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尽显才华，在社会科学理论园地留下自己栽培的一朵奇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入选这套文库，不应成为作者学术成就终结的标志，而应该成为新的起点。中青年是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我衷心希望广大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到改革开放实践的洪流中去，把握社会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行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认真学习新知识，扩大知识面，更新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改进研究手段，提高科研能力；敬业乐业，不畏艰辛，以扎实、严谨的学风，刻苦治学，勇攀高峰。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才会有朝气、有活力；我们的社会科学园地，才会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目 录

文化篇	(1)
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	(3)
简论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	(16)
思想家与文化传统	(25)
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	
——中国文化出路展望	(42)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56)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和分期	(76)
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流变	(92)
唯政治思维对文化建设的危害	(112)
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和特征	(120)
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	(130)
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	(152)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建设	(167)
 哲学篇	(169)
简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171)
简论道家思想在前期封建社会的作用	(178)
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192)
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	(203)
论《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思想同异	(216)

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230)
论董仲舒的道德哲学	(249)
论董仲舒的思想方法	(266)
董仲舒理想论阐析	(298)
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利用和改造	(322)
求善与求真：中西哲学的分野	(332)
新儒学篇	(345)
“现代新儒家”辨义	(347)
现代新儒学思潮：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	(356)
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	(364)
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	(376)
评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	(388)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文化思想简论	(407)
评牟宗三的道德理想论	(421)
后记	(439)

文化篇



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

近年的文化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文化理论的建设、西方文化理论的评介，论者提供了种种主张。然而对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则尚未见有人进行理论探讨；引进的西方文化学，在这方面也尚付阙如。本文拟从文化建设的理论高度，结合中国古代文化史实，论证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之所在，为新文化体系的创建，提供一个史论结合的参照点。

概括而言，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是：社会制度的创建；价值系统的奠定；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

—

要确认一种文化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首先必须厘定文化概念的内涵。我认为，就文化的深层结构而言，所谓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特点、反映其理论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

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等精神成果的总和。

这种理解，基于对文化结构的分析。关于文化结构，有“三因子”说、“三层次”说和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提出的“四层次”说。“三因子”说认为，文化由物质层面、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三因子”构成。社会组织层面介于物质和精神二者之间，是文化的骨干，其外在表现是典章制度。在文化变迁时，社会制度的惰性比个人行为的惰性更高，大凡制度愈僵化，其抵抗力愈强。精神生活层面相对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而言，是文化的核心，包括语言、心理和价值。语言是精神的外表，心理与价值则是其“内心”。^①

“三层次”说认为，文化包含着物的部分、心物结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如果把文化整体看作立体的系统，那么，最表层的是物质的层面，中层是体现心物结合的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以及隐藏在表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等；深层则包括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的物质层，最为活跃，变动不居；而理论、制度层，是最权威的因素，它规定着文化的性质；心理的层面，则最为保守，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②

“四层次”说认为，“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其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则甚难。现代世界各文化的变迁几乎都说

^① 吴文藻：《论文化表格》，载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附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上海初版。

^② 庞朴：《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第6—7页。

明这一现象。”^①

以上关于文化结构的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不过，我认为“三层次”说较为简明。本文便是以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为理论根据，以汉代文化的历史现象为材料，并结合文化变迁“四层次”说进行论证的。

根据以上思路，我认为，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中层结构，它既制约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的发展，又反映并影响着深层文化的发展。

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社会制度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文化整合，指把某种文化的要素综合得相互适应、和谐一致，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指出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主题整合。她指出，每种文化都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一个主题。该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这一主题，对不同的文化要素进行熔铸，加以组合，从而形成某种社会模式。

文化学家一般认为，文化整合的过程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在各种文化意义中的一种逻辑的、情绪的或美感的协调；（2）文化规范与行为的适合；（3）不同成分的风俗制度彼此间在功能上的互相依赖及其加强。

根据以上认识，考诸中国古代文化实际，我认为，社会制度的创建，是一种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具体标志之一。首先，社会制度的创建，标志着政治统一的完成和思想统一的

^①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3月初版，第48页。

进行，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是统治者自觉进行文化建设的反映。其次，社会制度的创建，确立了该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在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它对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起着规范作用，对处于文化深层的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也起着引领方向的重大作用。再次，社会制度的创建，使该国属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类别的文化要素（子系统），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制度之内，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统一类型的文化。同时，原来的不同文化要素（子系统），又可以在整合后发挥更大的功能。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真正单位是‘制度’。……制度显然是混合着多种的功能的”。^①这种见解，如果从社会制度的文化整合功能方面去考察，就更容易加以科学的说明。

事实上，汉代创建的封建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位一体的土地制度；以中央集权为核心和特征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以儒为主、以法为辅，以阴阳五行为理论骨架、统合诸家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太学为主导的官方学校教育制度；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大一统的、多民族的、趋善求治的中国古代文化类型及其特点的形成，起了文化整合的作用。没有汉代各项社会制度的建立（及其健全），就没有后世所谓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正因为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各项社会制度的建立，才使中原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如巴蜀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等，相互吸收、融

^①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商务印书馆 1946 年 5 月上海初版，第 72 页。

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从而它们也分别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功能。同样，先秦以来的诸家思想，如儒、道、法、墨、名、阴阳、农等，是在汉代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历史要求下，在各项社会制度的规范下，经过董仲舒等大儒的制作，而统合为一的。

不少论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或同化力，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而又保持自身特色，这是很有见地的。但多数论者将中国文化这种开放性和兼容功能，归之于儒家的宽容精神，我觉得失之偏颇。就整体结构和功能而言，我认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很大程度来自汉代所创建并为后世所承袭的各项制度，以及这些制度间在功能上的整合。

汉代创建的各项社会制度，其文化整合功能极其强大。这种强大的功能，整合了不同文化的特质，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增强了它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因此，虽历经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但中国文化仍挺立于世，而不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朝消退。这些有力地证明，社会制度的创建，是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之一；汉代各项社会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文化成熟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之一。

二

近几十年来，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看作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整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广泛接受。

依照文化学家的观点，所谓价值系统，指一个人所持有的或一个团体所赞同的一组相关价值，它是一种文化系统的基础，或一种“文化精神”。^①

我大致接受以上观点。不过，从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着眼，我觉得可以将价值系统这一概念修正为：个人或特定社会群体（民族）所持有、并借以指导其行为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它是特定文化系统的核心，是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它是相对稳定的，但又历史地发展着。价值系统的奠定，反映了特定类型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是该文化臻于成熟的标志。

首先，价值系统的奠定，是文化类型确立的前提。所谓文化类型，是指历史上形成的、特定的社会群体（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等思想文化的最本质特征。一种文化类型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其关键在于该文化的价值系统的特质。价值意识的自觉，价值系统的建立，是特定文化系统凝聚力、向心力之所在，是该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根据。其次，价值系统的奠定，对于特定类型的文化，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和价值观方面的导向作用。文化价值系统的奠定，形成了一个主导型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社会制度特别是文化价值的整合作用，使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学派的文化，逐渐渗透、融

^① 参见《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第 1 版，第 345—346 页。

合，趋于一体。一体化的价值系统一旦确立，无论它是一元化的还是多元化的，也无论它是封闭型还是开放型的，在客观上，它都起着价值导向的作用。再次，价值系统的奠定，有助于开辟人的价值意识，提升人的文化精神生命。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趋善弃恶、求真去伪、崇美贬丑的价值意识。如果说，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意识并非理性的、自觉的，那么，在该民族的价值系统奠定以后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是用全社会认同的价值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以求得与社会的一致。这种情况表明，价值系统的建立，对于人们价值意识的开辟，具有文化制约作用。同时，价值系统的建立，使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有更深切的领悟和认同感，对于个人文化精神生命的提升，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文化史来看，汉代所奠定的文化价值系统，确曾起到了上述诸种作用。简要说来，这个文化价值系统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方面，推崇大一统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强调政治权力的集中统一，忠君即是爱国；在经济方面，稳定小农经济，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德本财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提倡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在人生价值方面，强调人禽之辨，天地之性人为贵，个体的价值存在于整体的、族类的价值之中，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在道德价值观方面，躬行亲亲与孝亲的原则，三纲五常、重义轻利成为全社会自觉认同的道德规范；在审美价值观方面，以大为美，以自然为美，以善为美。

以这些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系统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形态的基础，增强了汉代文化的凝聚力，并成为后